

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

第三集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

第三集

岳麓书社

一九八二年·长沙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

(第三集)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责任编辑：杨坚 边仲仁

岳麓书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44,000 印张：17.5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1285·6 定价：1.65元

以類首

馭厚仁兄左右日前鼎丞枉過以山東

圖書館季刊見示非復承

既一冊竊致

左右為學之勤求書之勇治事之敏

真佛家所謂精進度也似所最悉心

者為評古拙篇及校勘三種此後希

得謙受

敬平 近日遠來劉河生所贈經典

釋文亦家忠其及顧校本亦欲一觀

葉氏元抄不意已到化于海原閣中

讀

左右託揚氏藏書為之悵惘

責館富於國籍它時冀得從

公劉覽之手肅敬頌

著祺六月十二日黃季剛首

黃季剛先生遺札之一



平未端于似頃有  
款唐仁元左右奉  
手書在漢守右刻拓本一種歡喜无量  
又惠集抄輝文也有下落願貴館收  
回後即付景印以垂經生海原閣宗元  
秘本書目 鼎并忘見付乞史  
一冊似資欽學進本敢言著述說文  
亦大書眉間有批語尚不能緝成一書  
世行禮學物說近事是  
覽油印尚胡鈔骨編撰謹自校正具  
述日學早益趨新奇似之所為猶是學  
究舊法世必笑之或不見非於  
雅德君子耳 承忠墨拓不收紙價尚有  
無廢之求欲得萬庵一集耳地  
俱著問時希  
嗣音響善鬱伏想  
隔術得宜黃似頃首

黃季剛先生遺札之二

堂館所錄洋石拓本英日左列の條

永和村墓刻石

合老老象

庚田

享子平

傳高後子

永和村墓久中為三溪命一由最有用蓋今文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之異文新溪為新尊祭之

新溪蓋三州新移言為上中新其命耳

難從孝廉而以確省為而心俗字之有理者

獻在先生教之

似又上

黄季刚先生遗札之三

编者附记：蕲春黄侃先生，字季刚，以精于小学音韵，有大名于近世，文章亦渊雅深厚，为时所宗。以上三札，乃致王献唐先生者。王氏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亦学术湛深，著述甚富。三札照片，为殷孟伦教授所提供，亟影印于此，以见前人治学谦谨之致。

# 目 录

- 与诸同志再论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张舜徽(1)
- 郑堂书札(与陈介祺先生论商周彝器手札).....潘祖荫 遗著(6)
- 释甲骨文尊田及土田 .....张政烺(11)
- 孙诒让读书札记汇辑 .....雪 克(16)
- 补三国兵志(卷下) .....王欣夫(大隆)遗著 徐 鹏 整理(39)
- 宋绶《契丹风俗》疏证稿 .....贾敬颜(52)
- 王弼《老子注》初校记.....蒙文通 遗著(61)
- 《庄子》辨正.....徐仁甫(65)
- 《周易疏》校后记.....向宗鲁 遗著(90)
- 元刊本《韩诗外传》题记两首 .....屈守元(100)
- 王若虚《史记辨惑》质疑(下).....颜克述(107)
- 《四库提要》介绍《续通鉴长编》一文正讹 .....崔曙庭(119)
- 标点本《北齐书》校议 .....陈连庆(124)
- 《宋史·刑法志》考异 .....顾吉辰、张道贵(136)
- 《清史稿·本纪》失书月序札记 .....汪宗衍(148)
- 高似孙对前四史研究的总结——《史略》初探.....高振铎(154)
- 李心传及其《旧闻证误》 .....来可泓(166)



《续通鉴纪事本末》及其作者	路志霄、朱平楚(174)
太平《辛壬寇纪》考跋	邹身城(177)
附：辛壬寇纪	(180)
评张之洞的《劝学篇》	蒋志杰(193)

### 试探中国何时开始用铁

——主要从古文献记载并结合有关方面谈一点看法	阙勋吾(198)
从云梦秦简看秦代中央集权制的历史作用	王瑞明(206)
秦国傅籍制考辨——读云梦秦简札记	罗开玉(211)
黄老思想论略	赵吉惠(218)
略论贾谊的政治思想	赵淡元(227)
论曾巩的“先王之道”	骆啸声(228)

劬堂随笔（读宋史札记）	柳诒徵遗著 柳曾符整理(51)(89)(106)(123)(192)
瓜蒂龠忆旧题记	谢国桢(248)
刘秀二三事	雷 敢(251)
北宋大文献学家宋敏求	颜中其(258)
书李秀成石达开	陈璟梅 遗著(264)
李商隐诗注版本举隅	王铁麟(269)
古文疑义例说——兼与冯端林同志商榷	王德元(271)

### 图 片

黄季刚先生遗札	扉页后
---------	-----

# 与诸同志再论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

张舜徽

从前梁启超谈到文献学时，便认为广义的历史学即文献学。这见解是很卓越的！将文献学的领域推廓得很广阔，明确了它的内含，极其丰富。举凡抒情（文）、纪实（史）、说理（哲）等方面的古代写作、资料，都应归纳进去。而其中又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研究、整理，才能取得成绩。从表面上看，似乎和历史研究工作者所进行的工作，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它的研究范围扩大了，要做的工作太多了，绝不是像今天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者们，每人只搞一段，或者一段之中只搞一两个专题研究，便可专门名家，很轻易地取得成功。所以梁启超把文献学看成广义的历史学，不是没有原因的。

“历史文献”四字，自可理解为“古代文献”。中华民族具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文献资料，真是浩如烟海。绝对不是做些校勘、注释等方面的零散工作，便算整理了文献。因为整理文献的任务很多，责任很大。凡属校勘、注释一类的工作，只能说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等待我们去做的较有意义的重要工作，却大有事在。所以在研究、整理古代文献之初，首先练好基本功，学些有关文字、声韵、训诂、版本、校勘、目录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是必要的。这几种基础知识，自然是读书入门必备的工具。如果对这些基础知识全无所知，怎么能进行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

谈到整理古代文献，当然不是校勘、注释几本书就完了。更重要的，在能从丛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内容相近的合拢来，不同的拆出去。经过甄别、审断、整理、纂录的过程，写定为简约可守的新编。替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方面，能够节省时间、精力，较有条理、有系统地了解过去，这诚然是文献学工作者的重任！我去年在《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一文中，提出“改造二十四史”、“整理地方志书”两大任务，与同志们共勉。不少同志，认为这一类的工作，需要的劳动量太大，旷日持久，不是一二人所易为力，从而产生畏难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但就范围较小、容易着手的文献整理工作，再举二例，分别说明如下，借以考见我们要做的事，至为广泛繁多，要在努力前进而已。

## 一、甄录古代遗文

远古留下的写作，最初多属单篇流传。到了某一时期，才有人把较多相近的资料，汇集在一起，成为一部书。在每一部书之内，篇目虽多，但从写作本身来讲，多不出于一时，不成于一手，这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总称之为古代遗文。整理这些繁杂的遗文，再也不要为

封建社会所加上的所谓“五经”、“九经”、“十三经”这类名目所束缚和局限了。无论“经”的称号，是后世所加，我们可以取缔，即经传标题，也要重新加以考虑。例如《周礼》、《左传》两书，是历代学者争论不休、问题最多的两部大书。争论的焦点，在于书出谁手和成书的年代。一直辩论了两千年，还没有得出适当的结论。这是由于首先对书的标题，没有弄清楚，以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来，古代用“周”名书的，原有二义：一种是代表朝代；一种是采用周普、周备、周遍的意思。《周礼》和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周政》、《周法》、《周训》、《周考》、《周纪》、《周说》一样，都是采用后一种含义。它是周末列国设官分职的综合纪录；是一部由战国时人纂成的官制汇编。由于不出于一地，不成于一手，所以有些地方，还出现彼此详略不同、内容重复的弊短。《左传》也是一部由战国时人哀录而成的列邦史实。看它叙述春秋列国时事，不独繁简各异，并且轻重有别。到了战国晚期，便有一位姓左的史家，将列国史官所记，纂为一书，成了《左传》。古人以“传”名书，本有二义：一为“传注”，一为“史传”。褚少孙称《太史公书》为《太史公传》，便是一例。后人硬要把《周礼》说成是周公致太平之书，把《左传》的作者看成是孔子口中所称道过的左丘明；无非是托名古人，来抬高其书的价值。这和易卦必托名于伏羲，本草必托名于神农，医经必托名于黄帝，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今天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要认真对待这一类的问题，再不可为旧说所惑。举此二例，可概其余。有了这种辨识能力以后，再进行具体工作，就容易下手多了。

自从后世将远古许多单篇写作哀集成书的体例一开，于是许多书籍里，便出现了内容复杂的问题，真伪淆乱的问题，在在需要整理。即如今日通行本的《尚书》，共有五十八篇。其中有真的，有假的，也有真、假参半的（事实是古代传说，文字出于后人追述）。假若分不清真伪，根本谈不上考证史实。但是这个本子，在社会上流行了很长时期，唐初诸儒修《尚书正义》，陆德明写《经典释文》，都是根据这个本子。一直到近代辑印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也都采用它。其实经过清代学者的考证，其中只有二十八篇，是比较可靠的材料，早已成为定论。这便需要将真伪分开，重新写定。像这样的古代文献，为数还不少（除经传外，还包括史、子群书）。凡是经过前人考辨，真伪已成定论；或者包括自己在内的研究工作者，续有发明，作出了确切结论的；我们都要去伪存真，加以整理，这是我们进行工作的重要方面。

其次，有些专门性的比较重要的古代单篇遗文，多附载在他书内，不被重视，因而缩小了或湮没了它的巨大作用。例如古代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说明书——《禹贡》，在《尚书》内；专谈科技制造的《考工记》，在《周礼》内；记录时令气节的《夏小正》，在《大戴礼记》内；详载古代教育事师细节的《弟子职》，在《管子》内；阐述农业生产知识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在《吕氏春秋》内。这都是有神实用的古文献，也就是最为宝贵的重要遗文，值得我们重视。可以从原书中抽出来加以整理和阐释。或者集编为一部书，以便于有志探索古代文化遗产者的阅读，这工作也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象上面所列举的古代单篇遗文，保存在群书中还很多。举一反三，可以旁推，不必在这里详述了。

古代遗文，也有保存在汉人传注中的。《诗三百篇》的《毛传》、出于西汉学者之手，是现存传注中最早的本子。它除解释字义以外，还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文献资料。例如《邶风·静女篇》“静女其娈，贻我彤管”《传》，便有“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的一段说明；《邶风·定之方中篇》“卜云其吉，终焉允臧”《传》，便有“建邦能命龟，田能施



命，……”等“九能”的一段内容；《王风·黍离篇》“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传》，便谈到了“尊而君之，则称皇天，……”等不同天号的意义（与《尔雅·释天》异）；《小雅·鱼丽篇》“鱼丽于罍，鱮鲨”《传》，便谈到了“古者不风不暴，……”有关庶物繁茂的原因；《小雅·车攻篇》“东有甫草，驾言行狩”《传》，便叙述了“田者大芟草以为防，……”有关古代田猎的方法；《大雅·烝民篇》“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传》，便指出了“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的旧制。这些材料，都是不见他书的古代轶闻。所以唐初孔颖达等在所修《正义》中便说：“此似有成文，未闻所由。”（《静女篇正义》）。或说：“此皆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鱼丽篇正义》）。或说：“毛时书籍犹多，去圣未远，其当有所依约而言也。”（《烝民篇正义》）。由此可见，唐初诸儒，早已将这些材料看成不知来原的远古遗文了。至于郑玄注《礼》、笺《诗》，每用“玄之闻也”详述有关的文献资料，尤为丰富。我们面对着这样多的文化遗产，有责任把它整理而甄录出来。

值得珍重的古代遗文，除大量保存在书本外，还有金石刻辞。现存的金文中，有些长篇，内容丰富，结构谨严，其价值不在《尚书》之下。就其中文字较多的长篇而论，毛公鼎刻辞，是周成王册命毛公的一段话。从文武创业及周召同心辅翼说起，转到守成不易，匡济需才。叮咛周至，委曲详尽。最后叙及颁赐诸物，品目繁多。全文凡四百九十七字，是金文中篇幅最长、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篇。其次，如散氏盘刻辞，记载矢、散两国勘定疆界之事，即《周礼》所谓“地约”。前半叙两国疆界所经之道，立表以为标识；中叙两国官吏履勘之事；末叙两国誓辞及绘图量器。凡三百五十九字，也是金文中的巨制。此外如孟鼎，申沈湎于酒之戒，行文视《尚书·酒诰》尤为简练透辟。虢季子白盘，叙成功，叙赐赏，通篇有韵，无殊雅颂，是金文中别开生面的一种写作。总之，现存的金文刻辞，无论长篇短作，史料价值都高。其可靠性，远远超过了《尚书》。至于石刻，自以秦始皇时所立丰碑为最可贵。始皇巡游天下，登山，凡六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都记载其辞，独未载峯山刻石之文。然而这篇遗文，至为简古。在颂秦功德之中，痛封建之为害，斥之不遗余力。比较《史记》廷议一节，还要翔实，史料价值，便可想见了。从汉以来，碑的应用愈广，可以考证史实的材料更多。其后，墓碣、墓志之属继起，在在足以辅翼史传。我们有必要从其中择取有代表性的写作，加以整理和甄录。

## 二、融贯诸子百家

周秦诸子，多不能自己著书，或者无暇著书。所以他们的著作，多属时人或后世学者纂辑其言论、行事，加以编次而成。尽管家数很多，思想、议论，各不相同；但是也有不少共同注意的问题，讨论阐发，不厌其详。有必要将这一类的见解，融会贯通，看出他们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识，由此可以考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作用。这对研究、解决中国文化史上许多难于得出结论的问题，是大有好处的。

例如周秦诸子谈及君道，同宗道德。究竟什么叫“道德”？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最高统治者想要以一人之聪明才力控制广大群众，使群众无条件地服从他，得以长期巩固他的权位，却不是一件太简单太容易的事。于是一些知识分子，为着有所干求于时君世主，便投了这个机。针对着当时统治者最苦恼的问题，拟出了许多成套的

办法，提供为统治天下的方案。其中如刑法、礼制等等，只是一些有形的具体措施，而不是最原则的东西。最原则的东西便是“主道”，或称“君道”，也就是“人君南面术”。

用“主道”二字作为篇名来标题的，始见于《韩非子》。由于它是阐明做君主的道理，所以有的书便称“君道”，见《荀子》；或称“君守”，见《吕氏春秋》；或称“主术”，见《淮南子》。此外尚有不用“君”或“主”字标题而别制篇名的，像《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韩非子》中的《大体》、《扬权》；《庄子》中的《天道》；《吕氏春秋》中的《圜道》；都是谈的这个道理。命名虽有不同，理论是一致的。我往年研究这种理论时，便综合周秦诸子中如上所述的许多篇，联系起来进行探索，对于他们所共同强调的“无为”，颇有悟入。于是总结前人理论，并且自抒心得，撰成《周秦道论发微》。将周秦诸子中共同所谈有关人君南面术的问题，进行了一次融会贯通的工作，收获是比较大的。

其次，如周秦法家著作中，强调法制，重视耕战，鄙弃儒学，黜斥空言，这是他们共同的宗尚。我早年读周秦法家书时，便综合起来，进行探讨。采录他们的名言警句，辑录为《周秦政论类要》。认为中国古文献中，没有完整系统的政治理论；只有周秦法家的书，才是政治理论的宝库。历代大政治家如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施政处事，莫不有法家精神，都是从周秦法家著作中得到启发，取得成功的。所以这一大堆历史文献，如果能从探索古代政治理论的角度去研究它、整理它，比较容易弄清楚许多问题。在这里，不过就我自己的学习经验，略举一二以示例而已。近人研究周秦诸子，重在校勘、注释方面的工作，而忽略了对理论方面的探求，这是一种不好的偏向。校勘、注释，诚然是很重要的工作；但这只是一种读书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研究周秦诸子的目的，在能弄清楚他们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以及对当时、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这便非从许多书本中融会贯通一番不可。

所谓“百家”，除继周秦诸子之后，两汉以来以“立言为宗”的写作外，还应包括后起的文集、笔记都在内。古代的私人著述，本来不多，重要的政治论文和抒情词赋，大半都保存在史传中。《史记》、《汉书》，便收录了不少。大抵史传中有名的大政治家、文学家的论著，被保留下来了，一生不过几篇，更谈不上有什么文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两汉、魏、晋人的所谓文集，都是后人补辑追题的。从南齐张融题所为文称《玉海集》，才是自编文集之始。历代相沿，新出不已。加以自隋唐以后，雕版印刷术盛行的年代里，写作流布的方法，日益便利，文集就日益增多。举凡一生所为抒情、纪实、说理之文，都荟萃于文集中。从质的方面来加分析，便有高下、浅深、精粗、优劣之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序》所谓“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别集类序》）。却是比较公正的评断！

况且每部文集中有世俗应酬之作，有祭神吊死之文；有诗歌，有表启；在当时本可不以入集，在今天便宜加以扬弃。这样有区别地进行甄核，一部集子中间，我们只注意到有关伦理、政治的论文；学术思想的阐述；确有发现、发明的科学纪录；世间稀见稀闻的事物记载；以及作者一生治学的心得总结，和在学术领域内的考证成果，便已够人探讨了。假如我们能就历代文集中甄录出许多有价值的政治论文，纂为一集，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选辑成《宋经世文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

时代愈晚，文集愈多，所以明、清两代文集，便已充栋汗牛。即以清代文集而论，真正有价值足以传世的，不过数十大家。特别是朴学家们的文集中，保存了许多有关诂经、证史、议礼、明制、考文、审音、诠释名物的专篇论著，假若我们能分类辑录，也可编出一些专门

性的“丛钞”，如前人所辑《经义丛钞》之类，自然是极有意义的工作。早在1945年，杨树达先生便曾提出《拟整理古籍计划草案》（见《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他认为我国古籍，所以隔阂难通，一由于文字之扞格，二由于制度文物之不明。如欲求古籍之大明，非从此二事下手不可。今日应著手编纂之书有三种：一为《经籍异文假字误字考》，二为《名物制度通考》，三为《新经义丛钞》。他的这一建议，所见甚卓。如果要完成任务，除取材于清人文集、笔记外，还要遍搜近几十年间的各专科杂志，发现其中有与经义有关的考证文字，便甄录在一起。既以帮助学者解决疑难，也可促进科研日臻精进，这仍然是我们整理文献者的职责。

谈到历代笔记，内容更为庞杂。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将小说笔记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序》分小说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派，尚不足以概括其全。大抵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第二是历史遗闻类，第三是考核辨证类。而后两种为最有价值。就拿清代笔记来说吧：有专谈身心修养的，如魏禧《日录》之类便是；有阐扬男女德行的，如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之类便是；有谈说狐仙鬼怪的，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之类便是；有称述因果报应的，如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之类便是；有载国恩家庆的，如潘世恩《退补斋笔记》之类便是；有叙友朋酬酢的，如金武祥《粟香随笔》之类便是。像这些笔记，于学术毫无干涉，也没有整理的必要。至于顾炎武的《日知录》，傅山的《霜红龕笔记》，刘献廷的《广阳杂记》，臧琳的《经义杂记》，汪师韩的《韩门缀学》，卢文弨的《钟山札记》、《龙城札记》，惠栋的《松崖笔记》、《九曜斋笔记》，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孙志祖的《读书胜录》，桂馥的《札朴》，洪亮吉的《晓读书斋四录》，梁玉绳的《瞥记》，臧庸的《拜经日记》，焦循的《易余籀录》，郝懿行的《晒书堂笔记》，周中孚的《郑堂札记》，邓廷桢的《双砚斋笔记》，宋翔凤的《过庭录》，洪颐煊的《读书丛录》，刘宝楠的《愈愚录》，汪士铎的《悔翁笔记》，周寿昌的《思益堂日札》，钱泰吉的《曝书杂记》，陈澧的《东塾读书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皮锡瑞的《师伏堂笔记》，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沈家本的《日南随笔》，缪荃孙的《云自在龕随笔》，这一类的写作，都是朴学功深，各记心得，便是我们研究整理的主要对象。纵不能分类钞纂，编为一书，也可按门类分条件系，编为目录，对提供学术研究方便，也是有益的。

上面所述“甄录古代遗文”、“融贯诸子百家”，和以前所提“改造二十四史”、“整理地方志书”结合起来，可算是我们文献工作者今天的四大任务。只要有勇气，有毅力，行之以渐，持之以恒，自然可以取得成绩，为国家文化建设服务的。但这仅仅是举例说明而已，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何尝只限于校勘、注释等方面呢？

文献学既是广义的历史学，范围极其浩博，内容极其丰富，有待于去粗取精，删繁就简，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将保存在历史文献中有用的东西，总结为一部足以反映中华民族全部文化的书，使全国人民都能从其中受到教育，取得知识，以激发其爱国之心。这是我们文献工作者无可旁贷的责任！我们要心怀大志，准备一切。等到条件成熟之后，努力编写一部体例新颖、足以总结一个具有几千年文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九亿几千万人民的伟大国家的通史。我们要为完成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奋发不懈，以达到我们整理历史文献的最终目的。



# 郑庵书札

(与陈介祺先生论商周彝器手札)

潘祖荫遗著

**编者按：**潘祖荫(郑庵)、陈介祺(篁斋)两先生，并以富收藏，精鉴赏，为晚清金石考证学家。此十五札为潘景郑先生供稿，详见跋尾。

## 第一札

篁斋年伯大人阁下：前三函想已达览。南苑归来，更无暇晷。十二钟字竟无计可施，笔画已平，无从下针，醴渍者并字失矣，奈何奈何！近得二者，当是精品，任在心目间者数年，然已毁废不堪，幸其字未损，的是至宝耳。孟鼎尚未来，廉生亦未愈，伏暑严寒，受之者深耳。敬复著安。任荫顿首。

得谕敬悉，十燕草堂及联语，均乞随便用纸书之。侄家藏赐纸，尽失於庚申。现在内中亦无，上所用皆购之厂肆，新纸极劣。匆匆不及详复。

## 第二札

十五日复一函，又《金文目》二册，《孟鼎考释》一册奉缴，计已达左右。近得古金及丙申角，拓呈。景剑泉以重直卖角而买颜家之仇十洲卷于何伯瑜家矣。侄所藏金文拓本，得便即寄呈，俟钤印或识数语，即照刻。孟鼎尚未来，左文当不致欺人也。廉生已愈，惟甚弱耳。此请道安。任荫顿首。

## 第三札

诏版一，亦叶氏物，已经火矣。闻之河南来者云：小午以八百金得一鼎新出土者，四五百字，未知确否？想甚秘之，无从访也。其说得之古董铺胡子英，子英闻之任道镛之子云：先还千二百金，后则辗转得之也。或曰：亦曰毛公鼎。十九日。

永寿石未得，乞赐。三代砖、北砖，均乞赐。附拓本八封。得一盘，与丁小农之盘款同，特字不可见耳。拓以呈上，以为何如？

《孟鼎考释》一册先缴。那钟，字之最完好者，因拓，昨日为小溪砗之地上，怅怅！

## 第四札

得书具悉。前交世兄笺纸拓本，又金文煦堂所藏目。昨又交世兄钟拓等，想可先此达览。

侄日来节事多忙，行围伊迹，益无闲适之致。少暇偃将三钟洗刷，其余则计无可施，看来仍须清醮也。拓本已寄，现仍是模黏一片也。孟鼎尚无消息，专此复请著安。年愚侄荫顿首。八月十一日。

新有人以尊来，价直百金，其字则不伪也。以无力得之，拓一纸奉鉴。侄又顿首。

### 第五札

得七月晦日书，并金文目二，释一册，无圈者是否均须一一注明。须侄自南苑归来，延廉生、仲怡来，将丈之目释及刘、许、李目释，一一核筭，并将原拓对过，下注篋目有，许、刘、李目有等字，再将无释者释之，其疑者不释可也。日来少暇，便洗刷一罇二钟。罇似有字矣，笔画太细，青绿太厚，字不尽出，则针无可施；又坚而滑，不受针醋，则不敢渍矣。其上字在影响中，细审之，疑前所得一罇五钟，皆同时出土。大罇，吾文既疑之，此一罇七钟，字竟纤细渺茫之甚，非此字尽出，不能定彼一罇也。前五钟大半为本家寻氏铲平求字耳。后又为醋浸，其青绿成块者，字在其中，铲平者无迹，醋浸平者尽水银沁色，可闷亦可笑。然其为有字则断然者。专此。复贺秋厘。中秋日。

在东华门外见一兔尊，拓文奉呈。似即《山左金石志》所收之器，其文在口内。牺尊兔尊有字者皆不多。（作鸡彝，是兔非鸡，遍身水银沁。）此其真否亦不可知，乞批示。

### 第六札

中秋复函，想先此达览。侄前后得齐罇二，钟十，其器无不被前途铲数十处或数处，以求字，子中罇即铲去一层者，或平或不平，但余青绿厚处，当可想是铜练凝结处，亦无法。南苑归来，将尽拓全形以呈左右，乞吾丈为细审之。以侄看法，是面面有字，非尽虎额纹，但花纹亦间其中，是以难辨耳。再颂著安。

前各拓均寄过，但非全拓。散片则前后不可知，又均模糊。南苑归来，洗刷既久，或稍清晰，亦未可定，全形亦较易看。

### 第七札

侄所得钟罇，除郟钟外，敬拓全分以呈鉴定。俟洗刷得多字后，当再拓以呈。至剔之一字，侄已无法，今之所谓剔者，若吴清卿、胡石查，皆以意刻字耳。奈何奈何！字文不清，针亦难施也。

其罇钟平处不多，惟其字画为锈凝结，两面相同，计无所出。其大罇则两面俱经铲过，有字一面无庸议，无字一面并铜锈亦不多。余则除青绿厚二钟外，余则皆铲多於锈，无计可施。惜哉，此十二钟也！丈若有良法，示知为妙。侄惟日以清水洗之百遍而已，连洗十余日，青绿去，水银出，字终不出，是洗刷之法，又不可也。

近见一簋，拓以奉鉴。与刘氏、吴氏（平斋）不同者四字，何欤？吴氏即顾湘舟器，似非真也。此则字文中似不伪，丈以为何如？

### 第八札

前交世兄觅便寄呈《笔记》四十本，《延氏金文目释》一本，想可先达览。伏惟闾潭集吉为

颂。侄甫办毕南苑笔墨七百余，而宁寿宫为改装修，上半年所办笔墨数百件，全归无用，即须赶紧缮写，现为未奉旨，扁联贴如何尺寸大小，均不得而知，势须南苑归来。然万寿在十月，为期促迫，更无暇矣。今年除请假四十日外，无日不与翰墨中涓为缘，实亦向来所无之事也。子年丈、廉生诸君，皆已两月未见，仲怡亦然，他客及应酬，更不待言矣。书之聊写近状，以博一笑。敬请道安，八月初四日。

允惠邢钟及觥、角、觚拓本，盼切盼切。近见数器。略得数器，恐未必真，即真亦不精也。容迟当奉呈耳。

寻氏所出大钟凡三，其一售於陕人，陕人刻字而以七白金售于翁玉甫，侄见其拓本矣。今以呈上。似其刻手不能伪，子中姜鏞也。拓本从玉甫中丞得之，彼秘之甚者。阅后如不留，仍祈掷下。

鲍丈处有丈函两册，侄已取来，交严六希转交陈巽卿抄送，以润笔抄出，约在十一月底。抄出后同侄处二册先行付刻。廉生未愈，清卿无信。两处本不多，可随后刻也。日来忙极矣。

### 第九札

得谕具悉，承关爱之至。那钟何忍弃？此八钟之第一也。余拓册及沙南碑各件，当交廉生。廉生设法寄呈八金，已即交廉生矣。余俟详细再申。廿五日灯下。

商妇觥、毕姬鬲久在厂中，廉生、春山辈久斥其伪，侄以究是燕翁故物收之。侄得燕翁器共十事，拟其斋曰十燕草堂。欲求吾丈赐书一匾。横尺余，高七八寸。又欲求七言小联。如蒙允许，不备纸，直求见赐，纸红色黄色均可。侄佩服最深，受教尤挚，虽惠函已盈尺，而扁联皆未有，用敢冒昧恃爱，为非分之求，当不见责。刻金文先摹文，丈有未圈者摹，余悉置之。十月望后，必当动手，因循过去，恐终无成。大著笔记及手书，拟以致何人为类，一字不动，省去时人名字，如退楼等。其标目应作何？曰簠斋集，或曰某某杂著，或曰某某笔记，或曰某某尺牍，乞定之。刻字拟仿张介侯养素堂姓氏五书式样，字较鲍集古雅可爱。子振樵古印极佳，以樵钟鼎当无不可。石查人事太多，强以所不好，真非所宜。舍此如无人，更一二人助之更佳。世方多故，萦心於此，知为识者所讥，然有心人应亮其苦心，知高江村一流人也。纵言所及，祈宥之。侄又启。九月十九日以上幸北海，例不入直，得半日闲。廉生尚未能起床。一切无从商办。清卿久无书，闻其甚苦，并欲送眷属返里，然无一字来也。孟鼎亦无信。

### 第十札

闻孟鼎已到常新店，即日可以入城，丈念之最切，敢以奉闻，当先以精拓寄呈耳。

丈所藏鲁字园足币，曾赠钟丽泉，又赠鲍年翁。如有多者，肯以一枚见赐否？惶恐勿责其冒昧为幸！

此种出何处？都门绝少此品。

又得一晋熏器，拓以呈。

小午与邱明大龃龉，巴里坤恐系空谈耳。虽未有，幸孟鼎已来也。

昨偶见二器，拓以奉呈，似均非伪，以为何如？廿四日午刻。